

打算研究“宗教”的青年费孝通

梁永佳

学界普遍认为,费先生不太重视宗教,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意义不大。但费马通信说明情况并非如此,青年费孝通认为“祖先崇拜”就是中国的宗教,值得长期研究。

“我已决定9月30日从法国上船,等不到我的书在英国出版了。我急着回去。吴[文藻]博士已经去云南创建我们的研究所了。我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计划,打算研究中国宗教,即祖先崇拜。我希望去田野工作之前得到您的批准。”

这段话摘自费孝通写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书信,时间是1938年9月10日。此时,28岁的费孝通刚刚获得博士学位,《江村经济》也脱稿付梓了,他即将启程回国。临行前,费孝通从伦敦寄信,辞别正在意大利小城博兹阿诺度假的导师。青年费孝通向马林诺夫斯基明确表示,自己的长远计划是研究中国宗教,即祖先崇拜。

这与我们熟知的费孝通先生颇为不同。学界普遍认为,费先生不太重视宗教,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意义不大。但费马通信说明情况并非如此,青年费孝通认为“祖先崇拜”就是中国的宗教,值得长期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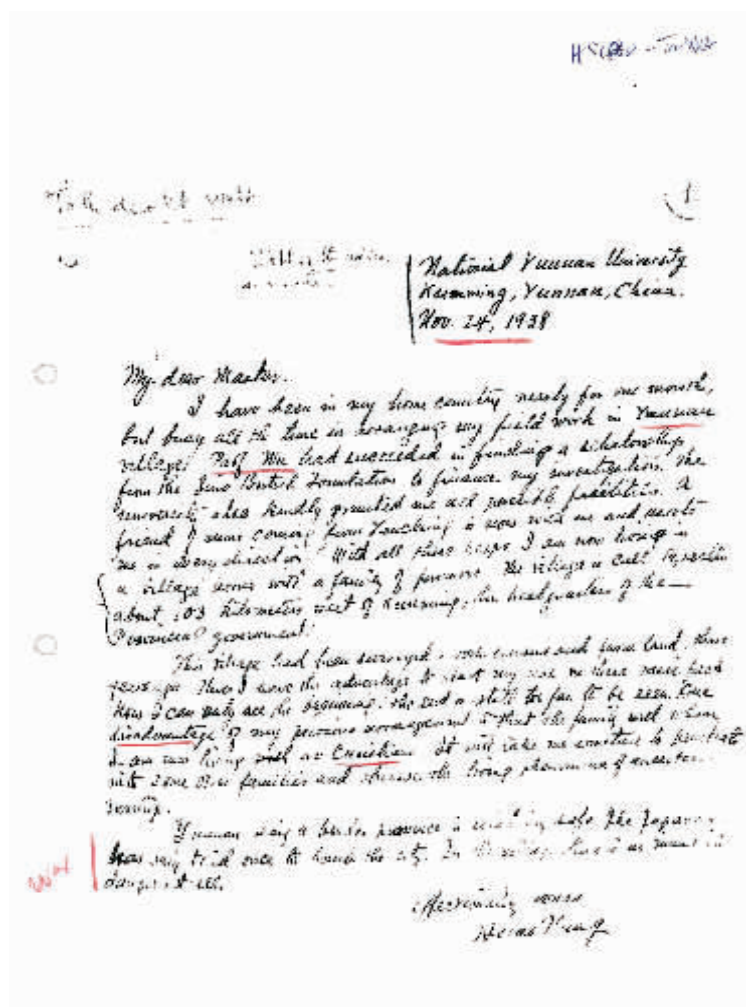
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一代宗师,特别欣赏这位中国弟子的才华,称他“值得我给予极大关注。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,双方受益良多”。马氏给他开小灶,让他到自己家里逐字逐句把论文草稿读给自己听,催促他赶在自己赴美之前完成答辩。马氏还跟梅贻琦说,自己将通信指导费孝通回国后的研究。临别,马先生又把为《江村经济》做序的稿费送给费孝通。在地球另一端,费孝通的业师吴文藻博士已经在昆明等着他加盟自己的研究所,开展实地调查。此时,中国东部已然沦陷,很多人的研究戛然而止,能到大后方展开实地调查,算得上一种学术奢侈了。青年费孝通不可能不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,更不可能随便想个题目应付继续指导他的马先生。“研究中国宗教,即祖先崇拜”的“长远计划”,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。

为何选择“宗教”做课题?费先生晚年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:“在通过我的博士论文《江村经济》答辩时,马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只是描绘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的农民,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物质生活长卷的开始,

他要我回国后慢慢再深入,继续描绘这幅长卷的其他画面,包括信仰、风俗等意识形态方面的、高层次文化内涵的文章,他甚至为我想好了第二本书的名字:Earthbound China。”费先生又说,马老师当时认为“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,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,包括宗教、意识形态、语言等等”。费先生晚年经常回忆青年时代,大量细节都能得到外围资料佐证,这次也不例外。彼时,马林诺夫斯基正在构思《文化的科学理论》,研究“信仰”、“宗教”等“高层次文化”的功能,正是这本著作的旨趣,可以说,马先生的建议同样是深思熟虑的。

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“宗教”,并非亚伯拉罕系宗教,甚至不是印度教、儒教这样的有经书体系的“高级”宗教,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“神秘契约”。它与巫术、科学等一道,发挥着整合社会的功能。马氏认为,宗教并无实用功能,却有着强烈的感召力,促使社会成员自愿遵守。依据马氏这一看法,费孝通将“祖先崇拜”视为中国宗教,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。“祖先崇拜”遍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发挥着维系家庭的功能,而家庭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制度。因此要认识中国,改造中国,怎么可以不从“家”出发?

费孝通实际上早有类似想法。早在留英之前的1933年,他曾写过一篇短文《宗教热忱》。借用派克,费孝通强调“任何社会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宗教色彩的”,这宗教“并不单指拜神的意思”,而是人们把整个身心投入一个目标并为之服务。宗教热忱维持着一切的社会制度,“最明显的是家庭”,“俗语所谓‘想不穿’,实在是维持着家庭的最大的势力。若是我们打着算盘说话,头脑冷静些,看看穿,父母们都觉得为儿女当牛马是一件不公平的事,这一念之差,立刻会使家庭制度破坏到不成样子”。费孝通接着说,人自知有死,想穿不难,难在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不去想穿“‘没有想穿’或‘不去想穿它’认真的做人,就是宗教



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通信中的一封(原件扫描,藏于耶鲁大学档案馆),也是唯一一封费孝通先生的英文手写信件。这封信是第一次公开,此前中外学界无人提及。

的热忱”,社会必须靠“看不穿”维系。他最后写道,中华民族能几千年“兀然独存”,就在于有孔子的“宗教热忱”,“世界上哪里有一种宗教能赶得上我们儒家那样的深沉彻底”。儒家是一种成全人生和社会的态度,是“其他宗教家所不能了解的,亦所不能及的地方”。

年仅23岁的费孝通,已经为中国宗教与祖先崇拜的关系破了题。《宗教热忱》的思路很清楚,既然任何制度的形成和维系都离不开宗教热忱,那么中国的改造必然始于“看不穿”,终于“看不穿”,同样需要宗教。但他在何为中国宗教问题上似乎尚无定论,一面说父母们凭着“看不穿”的热忱维系着家庭这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,另一方面又称赞儒家这一深沉彻底的宗教。马林诺夫斯基的宗教理论,帮助费孝通锁定了儒家与家庭之间的关联点:如果说宗教是日常生活中那种“看不穿”的热忱,维系着社会的整合,那么中国宗教就不该仅是文字里的“儒家”、庙堂上的“儒家”,而是“成全人

生和社会”的儒家、日常生活中的儒家、实践中的儒家,那就应该是祖先崇拜。只有它称得上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契约,称得上实践中的中国宗教。这并非出于对中国传统的诗性固守,而是对中国未来的理性判断。青年费孝通打算长期研究作为中国宗教的祖先崇拜,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宗教观与马老师的宗教观产生了共鸣。

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,打算研究中国宗教的费孝通,却写了一本几乎没有涉及宗教的著作《禄村农田》,并未完成他的计划。禄丰县大北厂村不乏宗教,《禄村农田》提到女巫、洞泾会、土主庙、圣谕会,甚至提到专门祭祖的团体,但费先生并未专门讨论,原因何在?

费孝通到达昆明不过两个星期,就进入禄村。9天之后,也就是1938年11月24日,他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说,“三年前,曾有人在这个村调查,有人口和耕地材料。因此,我可以很快从这些事实入手,这是有利条件。一个不利条件在于,先前的安排让我只能住在一个基督

徒家里。我要花点时间才能穿透其他家庭,观察活生生的祖先崇拜现象。”就是说,阻碍他研究中国宗教是另一种宗教——基督教。这进一步说明,青年费孝通并未忽视“宗教”,更没有因为阅读韦伯而断定中国现代化无需宗教,他坚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宗教,且与基督教格格不入。但是在禄村,相对宗教而言,土地问题有现成的资料,更容易研究也更可行。

第一次禄村调查只有38天,帮助费孝通进入田野的是他基督教姨母杨季威和燕大同窗王武科,而他却特别感谢了李有义先生,称“在人事方面得到他极大的帮助”。虽然我们无从知晓“人事”指的是什么,但基督教家庭很可能构成了研究祖先崇拜的巨大障碍。此时,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有繁重的教学工作,魁阁研究团队刚刚建立起来,百事缠身的他,只能利用1939年的暑假,完成第二次、也是《禄村农田》成稿之前的最后一次调查。除了专注土地问